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15-07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王丽云, 周毕芬, 赵清军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质量;市民化意愿;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3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群体。由于受到户籍等多重障碍,农民工长期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他们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户籍仍在农村,社会身份仍然是农民^[1]。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虽常住在城镇中,却并没有获得城镇户口。近几年来,国家开始不断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并未有所增强。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否愿意在城镇落户,不单是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挖掘农民工进城不落户的原因对提升户籍城镇化率和实现新型

城镇化战略尤为重要。

农民工进入城镇获取就业机会以及城乡收入差,以满足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因此,就业质量的好坏将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存质量,以及对城市的适应和归属感^[2]。当基本需求层次得到满足后,农民工群体才会转而考虑市民化问题。目前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保障等视角,对于就业质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性别差异可能导致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的不同影响,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推动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本文将基于厦门、漳州614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探讨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实现新型城镇

收稿日期:2018-07-08

基金项目:福建省软科学项目“农民工城镇就业可持续性与市民化耦合及政策研究”(2017R0013);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进程研究”(闽农林大社科[2017]8号)。

作者简介:王丽云(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

本文信息:王丽云,周毕芬,赵清军.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15-20.

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农民工市民化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意愿—行为”模式,即农民工的市民化行为是由意愿转化而来的^[3]。因此,通过分析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有效地预测市民化结果。

学界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主要是从制度保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王桂新认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的城乡差距影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进程^[4]。王竹林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只是市民化的动力,能否市民化还取决于市民化的能力^[5]。刘传江、周玲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的考察认为社会资本的使用有助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从而有利于其城市融入^[6]。但是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系统地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少,就业质量的好坏是否能提升或增强市民化的意愿,尚未得到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

(二)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就业质量综合反映了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国外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第一次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即让劳动者可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有尊严地进行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从“体面劳动”的狭义概念来说,它主要是指就业质量^[7]。学者Beaston将就业质量的相关指标进行分类,一类是外显就业特征,包括经济收入、工作时间、就业安全、提升机会等;另一类是内隐就业特征,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紧张感、疾病/伤残风险等^[8]。Lucie&Christine根据就业质量概念的演进发展,提出就业质量还应包括合理且具有公平性的工资、技能与培训、工作条件、工作和家庭兼顾与性别平等内容^[9]。2000年欧盟委员会将“工作质量”的概念进行推广,制定了一系列测量工作质量的指标^[10]。欧洲基金会将就业质量的测量划分为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和谐^[11]。就业质量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国内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关注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就业质量及其指标问题。马庆发提出应“提升就业质量”而不仅仅是关注就业率,将就业质量划分为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方面^[12]。刘素华建立了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将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量化为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劳动合同、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要素,并赋以不同分值^[13]。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将就业质量指数划分为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的内容^[14]。部分学者还增加了劳资关系、个人幸福感、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等衡量指标。这些因素都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

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王桂新、胡健认为获得良好的收入保障是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原因^[15]。当农民工的收入较高时,才能够支付在城市所需的各种生存成本,进而考虑落户或定居的问题。工作时间是指农民工从事工作或者生产的时间。农民工提供劳动的时间越长,其“闲暇”即用于各种娱乐消费的时间就越少。过长的工作时间,使得农民工无暇关注城市发展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进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从而影响其城市融入。

职业地位通过职业类型来测量,职业类型的不同,意味着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较高的职业地位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收入来源,还使得农民工能够从中得到尊重,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促使农民工产生市民化的意愿。

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重要表现。农民工通过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稳定了工作和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其在城市环境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黄乾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增强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往来,进而影响其定居意愿^[16]。因此,就业的稳定性有利于促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增强。

劳资关系表现为就业过程中农民工和雇主的关系是否和谐。在我国,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参与工会后,当农民工面对强迫劳动、工资拖欠等情况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对

农民维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参与工会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以及就业指导等服务,可以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拓宽本地朋友圈,提升对城镇生活的幸福感及工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市民化的意愿。

农民工的工作保护由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构成。社会保障为农民工抵御风险解决其后顾之忧。由于农民工个体障碍因素的影响,一旦面临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时极易受到重挫。社会保障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福利体制内,增强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维持生计的安全感,进而提升市民化意愿^[17]。住房公积金的缴交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压力,实现安居,从而有利于其融入城市,增强市民化的意愿。

作为个体就业质量主观维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和生活幸福感都具有重要影响。李丹等认为实现生活满意度是驱动农民工入户城镇的主要原因之一^[18]。农民工对于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越满意,其定居或落户于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可能选择回到农村并保留农村户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数据来源于就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项目课题,对厦门、漳州两地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展开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市城镇地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口人员,年龄16~65岁的农民工。发放问卷共650份,其中有效样本616份,有效回收率94.8%。由于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为614份。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市民化意愿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以往的研究中学者选取测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指标都有所不同。姚植夫、薛建宏将“获得城市户口的意愿”、“定居城市的意愿”和“按照城市生活方式生活的意愿”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衡量指标^[19]。蔡禾将“永久迁移意愿”操作化为“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和“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20]。因而,本文将市民化意愿操作化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其中,城市定居意愿

通过被访者的回答“您是否愿意在本地定居”测量。被访者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比较愿意、非常愿意等中进行选择。城市落户意愿通过“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进行测量,被调查者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比较愿意、非常愿意”等选项中进行选择。为了更加简单明了展现市民化意愿,在建立模型时,将在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中同时选择“比较愿意或者非常愿意”,合并为“有市民化意愿”,即用1表示,将选择“很不愿意、不太愿意、说不清”归为“暂无市民化意愿”,用0表示,最终市民化意愿为二分类变量。

2. 自变量

就业质量是指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通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指标对就业质量进行测量。参照已有的文献研究,本文将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等6个方面。

劳动收入通过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进行测量,以收入取对数纳入到最终模型分析。工作时间通过每周加班天数进行测量,询问被调查者每个月工作几天,将工作天数除以四得出每周的平均天数,超过5天即为加班赋值为1,没有加班赋值为0。工作类型主要是询问被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类型(普工、管理人员、技工)考察,以普工作为参照组。就业稳定性通过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指标。签订劳动合同赋值1,未签订劳动合同赋值0。劳资关系主要通过是否加入工会来衡量。参加工会为1,未参与工会为0。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若被访者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则赋值1,若没有则赋值0。将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降为同一维度,并赋予权重来衡量其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工作满意度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当前的工作满意程度,分为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和非常满意=5。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还可能受到个体特征、本地就业年限、住房等因素影响,因此控制性别(男=1,女=0)、教育(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本地就业年限(连续变量)、是否购房(已购房=1,

否=0)等变量。

四、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现状分析

总体上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强,其中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174人,占比28.3%,而不愿意市民化的比例达到了71.7%。女性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95人,占比35.2%。男性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79人,占比23%。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更渴望待在城镇。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所附着的各种权利,使得男性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于城镇。同时男性农民工较常是一人外出务工,受家人牵挂等影响,因而市民化意愿不高。

(二)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表1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男性样本)	模型3(女性样本)	模型4(总样本)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性别	-0.588*** (0.191)	—	—	-0.391* (0.206)
受教育程度	0.422*** (0.0864)	0.473*** (0.145)	0.315** (0.143)	0.357*** (0.0978)
本地就业年限	0.0730*** (0.0167)	0.0818*** (0.0248)	0.0777*** (0.0274)	0.0724*** (0.0176)
是否购房	0.851*** (0.250)	0.962** (0.386)	0.705* (0.370)	0.816*** (0.262)
月收入对数	—	-0.522* (0.307)	-0.501 (0.380)	-0.441* (0.233)
每周工作时间	—	0.166 (0.337)	-0.995*** (0.321)	-0.432* (0.223)
管理人员	—	-0.282 (0.391)	-0.930* (0.490)	-0.468 (0.298)
技术人员	—	-0.266 (0.491)	0.100 (0.982)	-0.271 (0.422)
签订劳动合同	—	-0.299 (0.332)	0.628* (0.339)	0.136 (0.229)
加入工会	—	-0.698 (0.458)	-0.0800 (0.448)	-0.325 (0.311)
社会保障及住房公积金	—	0.736*** (0.248)	-0.140 (0.241)	0.284* (0.168)
工作满意度	—	0.324* (0.183)	0.434** (0.198)	0.382*** (0.132)
<i>_cons</i>	-2.463	0.154	0.925	0.322
<i>N</i>	614	(2.589)	(3.104)	(1.910)
		344	270	614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1. 控制变量与市民化意愿

从表1中模型1可知,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性别、教育差异。女性的市民化意愿是男性的0.555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在城镇就业的竞争优势就越大,有利于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市民化意愿更高。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年限越长,其市民化意愿越强。长期在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的适应性,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使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更加强烈。在城市是否购房的市民化意愿是未购房者的2.341倍,这说明能否在城市安居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镇,完成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就业质量相关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3、模型4,见表1。具体来说,劳动报酬不论对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都表现为负相关的关系,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相同。杜宝旭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的重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差异使得农民工面临着更高的生活消费成本^[21]。李晓阳等认为,农民工的收入虽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所享有社会福利等差距才是市民化的关键要素^[22]。因而,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而言,在城市高房价和巨大的城市生活压力下,其返乡的可能性变大,市民化的意愿也因此降低。

工作时间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过长的对于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显著负向影响。过长的劳动时间使得女性农民工的休息和闲暇的时间减少,导致她们难以兼顾家庭以及构建本地朋友圈,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进而降低其市民化的意愿。工作时间对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可能由于大多数男性承担家庭重任,工作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加班费更多劳动报酬更高。

与普工相比,女性从事管理岗位的市民化意愿较低。可能是由于女性农民工从事管理岗位的压力大,对自身未来规划还不明确。从工作稳定性来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是未签订者的1.874倍。女性农民工通过劳动合同来稳定工作关系进而提升定居于城镇的意愿。

劳资关系主要表现为是否加入工会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被调查者中参加工会的人数不多。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工会组织的存在,或者是单位没有建立工会。

是否享受企业所提供的就业保护关系到农民工在城市抵御疾病、失业、养老等风险的能力。通过模型可以看出,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说在城市落户的前提是能够安居乐业,而住房公积金的缴交无疑有利于其在高房价的背景下实现安居梦,合家欢。社会保障有助于其在城市抵御各种突发风险,提高城市生活安全

感,进而提升男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工作满意度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市民化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进城是为了寻求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甚至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因而,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对于城市的认同感越强,越渴望留在城市,其市民化的意愿也就越强,

五、结语和讨论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23]。因此,基于性别差异视角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厦门、漳州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初步描述,并通过建模方式测量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城市户籍制度逐渐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明确的市民化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第二,较高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对于男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但城市高消费成本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职业类型和有无参与工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在开放户籍制度以外,综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应该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制度保障。农民工来到城市务工的初衷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机会,但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二元格局,农民工常遭遇到工资拖欠且不高、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形同虚设、社会保障不到位、性别歧视等问题。因此,加强对企业的合同签订、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性别歧视等多个环节监控,充分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害。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住房公积金。有序推进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参与,支持农民工住所所居、居有所住。同时对在本地就业年限较长的农民工提供优惠性租房和购房政策。

再次,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市场上,自身条件和能力越高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淘汰。可以根据不同性别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课程,具体分析指导,增强其在城市就业的可持

续性。

最后,企业应主动承担并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帮助农民工提升就业质量的主体之一,企业可以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为农民工提供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让农民工更好地体面劳动,提高其对城市的认同感,进而增强市民化意愿,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蒋国保.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分析[J]. 特区经济, 2005(12): 130-132.
- [2]聂伟, 风笑天.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6): 34-42.
- [3]张笑秋.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J]. 调研世界, 2016(4): 17-22.
- [4]王桂新, 胡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 人口学刊, 2015(6): 45-55.
- [5]王竹林.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31(2): 28-32.
- [6]刘传江, 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 2004(5): 12-18.
- [7]国福丽. 国外劳动领域的质量探讨: 就业质量的相关范畴[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1): 86-91.
- [8]Beatson M. Job quality and job securi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job quality and ways of measuring one of its aspect, job security [J]. Labour Market Trends, 2000, 108(10).
- [9]Lucie Davoine, Christine Erhel. Monitoring employment quality in Europ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dications and beyond [R]. Document de travail, 2006.
- [10]European Commission. Taking Stock of Five Years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C]. Communication 7. 2001.
- [11]European Foundation. Quality of Work and Employment [C].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1, 2002. : 6
- [12]马庆发. 提升就业质量——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视角[J]. 教育与职业, 2004(12): 6-8.
- [13]刘素华. 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和方法[J]. 人口与经济, 2005(6): 34-38.
- [14]赖德胜.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5]王桂新, 胡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 人口学刊, 2015(6): 45-55.
- [16]黄乾. 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 人口研究, 2009, 33(3): 53-62.
- [17]徐延辉, 王高哲. 就业质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4(2): 101-111.
- [18]李丹, 李玉凤.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7): 151-155.
- [19]姚植夫, 薛建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14, 36(3): 107-112.
- [20]蔡禾, 王进. 珠三角“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与影响因素(英文)[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3): 157-171.
- [21]杜宝旭. 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成本收益均衡系数及其城镇化效应[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4): 98-109.
- [22]李晓阳, 黄毅祥, 彭思颖. 1989—2010年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商业时代, 2013(13): 6-8.
- [23]蒋国保.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分析[J]. 特区经济, 2005(12): 130-132.

(下转第 49 页)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practice, and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system has been increasingly improved,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urbulent world situation, weak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earing up of Western democracy, China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such as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remarkable enh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distinct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Histor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ety, which prov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road,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demonstrated the high confidence of Chinese people and consolidated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ur confidences

(上接第 20 页)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Peas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Xiamen and Zhangzhou

Wang Liyun, Zhou Bifen, Zhao Q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614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and Zhangzhou,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binomial logistic model and analyz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come citize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 urbanized is not strong, only 28.3%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become citizen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to become citizens than 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higher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labor contract signing, job satisfaction),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For 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with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ing provident fund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citizens. The low quality of employmen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grou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quality of employment; willingness to citizenship; gender differences